



非洲经济转型： 中国投资发挥的作用

Linda Calabrese 和唐晓阳

2020 年 6 月

DFID-ESRC 增长研究计划简介

英国国际发展部 - 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 (DFID-ESRC) 增长研究计划 (DEGRP) 资助关于低收入国家 (LIC) 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世界级科学研究。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开展政策相关的研究：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增长、农业与增长、创新与增长以及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参与情况。

鼓励读者复制 DEGRP 出版物中的材料供自己使用，但不得用于商业出售，并应以适当方式致谢。如果是在线使用，我们要求读者提供 DEGRP 网站上原始资源的链接。

封面图片：埃塞俄比亚纺织工厂工人，2019 年 © Davide Scalenghe 版权所有。

本报告中 Davide Scalenghe 拍摄的所有照片均属于 SOAS 项目的组成部分非洲的工业发展、工程建设与就业。

作者简介

Linda Calabrese 是海外发展研究所 (ODI) 国际经济发展小组的研究员和证据与政策小组 (EPG) 的中非负责人。

唐晓阳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中方主任。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中国在非洲的参与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鸣谢

本报告综合了 DFID-ESRC 增长研究计划 (DEGRP) 开展的研究。作者谨此感谢 DEGRP 研究人员和 2019 年 9 月 20 日在 ODI 举行的研讨会的所有参与者，他们献计献策，形成了这一综合概念；感谢 2020 年 5 月 14 日同行评审圆桌会议的参与者，他们为本报告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和反馈。感谢 DFID 和 ESRC 提供的支持。

我们还要感谢 ODI 的 DEGRP 证据与政策小组，特别是 Louise Shaxson、Aaron Bailey-Athias、Dirk Willem te Velde、Elaine Antwi、Harriet Flower 和 Amanda Jones，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提供了大力支持。错误和遗漏是我们自己疏忽所致。

目录

作者简介	3
鸣谢	3
缩略词	5
概述	6
1. 前言	9
2. DEGRP 研究	10
3. 非洲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投资：微观证据	15
4. 非洲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投资：宏观证据	21
5. 政治与机构	26
6. 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空白	28
参考文献	32

专栏与插图列表

专栏

专栏 1 DEGRP 研究	14
---------------	----

插图

插图 1	
2000 – 2018 年非洲对华贸易进出口额和贸易余额	10
插图 2	
2003 – 2018 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	11

缩略词

CHINCA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DEGRP	DFID-ESRC 增长研究计划
FDI	外国直接投资
IDCEA	非洲的工业发展、工程建设与就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SOE	国有企业
UN	联合国

概述

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在非洲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参与度显著提高。这使得人们对中非交往振兴非洲、促进非洲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了一定的期待，但也让人们可能对出现的潜在挑战提出了质疑。在此背景下，DFID-ESRC 增长研究计划 (DEGRP) 开始开展研究，旨在解决与中非发展关系及其对非洲经济和民生的影响相关的问题和质疑。

本综合报告使用了 DEGRP 研究等资源提供的证据，评估中国的贸易、投资和金融是否促进了非洲的经济转型以及如何促进这种转型。我们从 DEGRP 提供的大量证据中提取见解，并通过更多文献进行界定。鉴于考虑行业内生产率提高以及行业间资源的流动，我们从经济转型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在非洲的参与 (McMillan 等, 2017: 66)。

需要注意的是：本综合报告中所采用的研究在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开展。但这些研究结果对非洲各国政府仍然极具价值，因为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从疫情导致的经济冲击中复苏，以及中国投资可能在复苏中发挥的作用。

- DEGRP 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现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给非洲工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本地化率很高。这些工作大都是低技能和半技能型岗位。研究发现，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和本地化程度因国家和行业特点而异，但总体而言，对创造就业机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方面，DEGRP 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比较视角，从不同国家、行业和企业类型探讨了这些问题，并将中国企业和非中国企业进行了对比。
- 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会培养东道国工人的

技能。中国企业通常会向本地工人提供某种形式的培训（正式程度各异），但较复杂的技术和管理任务仍经常由中国员工负责。比较研究发现，在管理知识转移方面，中国企业和欧洲企业差不多。

- 确实产生了水平溢出效应，但程度有限。对于非洲企业而言，吸收中国同行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仍然比较困难。这与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劳动力流动性较小以及资本获取能力有限有关。
- 在垂直溢出方面，DEGRP 研究表明，通过建立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垂直知识转移，比通过示范和竞争的水平转移更有效。尽管长期的供应或分包关系非常有益于提高非洲企业的生产率，但现在这种关系很少见。同样，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例如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例子很少，不常见。
- 在薪酬和工人生计方面，DEGRP 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与其他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没有差异。据发现，中国企业有时会向工人提供非工资福利。
- 在非正式行业，外国的参与对非洲民生的影响并非总是正面的。负面影响不仅存在于与中国投资者的关系中，在与其他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同样存在。这表明，这类行业存在潜在弱点，不能实际支持这些行业的员工生计，因此呼吁在行业/东道国层面寻求解决方案，而非让中国企业有针对性的参与。
- 在宏观层面，DEGRP 研究突出表明，中国投资往往有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生产性行业（制造业）的投资。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投资还有助于促进现有行业（建材制造业）或开创新行业（赞比亚的

紫檀)。虽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工业化中的贡献已有广泛讨论 (Qobo 和 le Pere, 2018; Lin 和 Xu, 2019), 但 DEGRP 研究强调了中国的参与如何出人意料地帮助开创了新的行业。

- DEGRP 开展的许多研究证实, 平均而言, 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 而非出口导向型; 确认了早期对此事的看法 (Kaplinsky 等, 2007)。这表明中国投资者并不将非洲国家视为为第三方市场生产低成本产品的投资目的地, 而是认为其本身即可作为切实可行的市场。因此, 中国投资的贡献不在于促进了非洲的出口, 而是在于为非洲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渠道获得更便宜的商品。
- 此外, 中国投资可以帮助疏通经济增长瓶颈。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开展进一步的经济活动, 并产生溢出效应。这包括在许多非洲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园区。
- 对华贸易对非洲国家经济转型的影响似乎比较复杂。商品出口增加看似有利于商品出口商, 但也在非洲某些地区 (尤其是西非) 造成了“荷兰病”。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已经与非洲工业形成竞争, 并给后者造成负面影响; 但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也促进了良性竞争。从中国进口机械也使非洲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 DEGRP 研究进一步表明, 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多个构成要素同时发挥作用。资源 (特别是劳动力) 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受特定国家和行业条件的影响, 需要同时解决这些条件。
- 最后, DEGRP 研究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研究结果如何受研究环境和所涉利益相关者的特征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 需要了解特定非洲国家的当地情况;

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投资者和金融家的具体特征, 以及他们的动机和惯用做法也应成为分析的对象。

本研究对政策有重大影响:

- 建立联系需要有针对性的支持。虽然创造了就业机会, 但非洲企业发现很难与中国企业建立联系。决策者需要建立机制和政策工具, 以促进在中非企业之间建立这些联系, 增强他们的合作能力。
- 促进沿着价值链发展, 而非孤立的项目。研究表明, 通过建立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垂直知识转移, 比通过示范和竞争的水平转移更有效。因此, 政策重点应聚焦于将外国直接投资 (FDI) 项目与本地上下游企业联系起来。
- 考虑支持合资企业和其他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研究表明, 尽管中非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和其他长期合作方式极具潜力, 但这些关系不多见。支持这种伙伴关系可能是加强知识转移的有用途径。
- 培养管理技能, 鼓励劳动力流动。虽然中国企业帮助低技能和半技能型员工培养技能, 但仍不具备更高端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但后者似乎更加重要, 因为它们不仅对企业有利, 还可产生溢出效应。例如, 孟加拉国的成衣业快速发展, 是由于技能型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流动, 突出了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同理, 非洲国家也可以鼓励劳动力流动。
- 监管规避恶性竞争。由于中国投资者经常运用新的商业模式打破现有市场惯例, 因此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没有相应法规监管的“逐底竞争”。加强治理和监管 (例如设置社会环境责任要求、行业最低工资标准) 将有助于维持健康的市场秩序。
- 了解并针对性地吸引中国投资。一些研究还表明, 除为所有外国直接投资创造良好

的投资环境外，一些特定因素对于针对性地吸引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非常重要。针对性的政策是对一般扶持政策的必要补充。DEGRP 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中国投资的目的是进入当地市场，而非追求较低的出口成本。针对性的招商引资应考虑这一点，考虑国内市场的机会。

- 注重后期服务并维持良好的投资环境，留住投资者。由于中国国内成本上升和/或对当地市场的兴趣增加，中国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到非洲投资，但是，恶劣的投资环境

和不断变化的政策经常令非洲的中国投资者感到沮丧。这也破坏了名声，让其他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打造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将有助于非洲国家留住投资。

- 关注非正式行业有助于改善民生。许多非洲国家的非正式行业为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是国民经济的较大组成部分。与其专注于特定的外国投资者群体，不如采取针对整个行业/价值链的措施改善非正式行业经营者的生计。

1. 前言

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度显著提高。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大背景、以及促使中国加强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对外联系的因素，已经转化为对非贸易增长以及投资流量和基础设施融资增加。

随着与非洲国家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日益增长，人们更加期望中非交往有促进非洲经济增长的潜力，但也有人质疑中国的活动面临潜在挑战。许多人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国是经济增长和脱贫的最佳典范（Lin 等，1996；Fan 等，2004；Heilig 等，2006），是非洲国家可以效仿的潜在榜样（Ravallion，2008），但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就中国的参与对非洲创造就业机会、民生、增长等领域的潜在影响提出了问题和怀疑。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加细致地了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动机、方式和影响。

DEGRP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解决与中非发展关系及其对非洲经济和民生的影响相关的问题和质疑。本综合报告使用了 DEGRP 研究以及其它来源提供的证据，以更好地了

解中非交往的影响。我们从 DEGRP 提供的大量证据中归纳观点，并通过更多文献进行佐证。我们引用经济转型的概念（McMillan 等，2017），以界定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鉴于行业内生产率提高和行业内资源的流动，经济转型不仅要考虑增长，还要考虑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就业机会，同时改善民生和经济体系的弹性。

本综合报告结构如下：第 2 节介绍 DEGRP 的工作成果；第 3 节和第 4 节提供证据说明中国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在非洲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第 5 节综述政治和制度的作用；第 6 节是本报告的总结部分——总结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并找出研究空白。

需要注意的是：本综合报告中所采用的研究在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开展。但这些研究结果对非洲各国政府仍然极具价值，因为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从疫情导致的经济冲击中复苏，以及中国投资可能在复苏中发挥的作用。

2. DEGRP 研究

2.1 中非关系：证据与谬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参与非洲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转型，双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 2000 年以后（Power 和 Mohan，2010；Shinn，2019）。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中非交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自 21 世纪初开始，这种变化的速度显著加快。本节首先综述中国对非贸易、投资和援助的主要趋势，为后续各节介绍研究结果奠定背景。

早在 2007 年，中国就已经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进口来源国；2012 年，中国成为非洲大陆的主要出口市场。中非贸易关系在数量、

结构和来源方面均不平衡。2012 年以来，非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一直为逆差。非洲出口中国的产品中，90% 是燃料、矿产和金属，而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种类繁多。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UN，n.d.），2017 年，非洲出口中国最多的四个国家（安哥拉、南非、刚果共和国和加纳）占总出口 80% 以上。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可能损害非洲多元化和工业化的前景（Qobo 和 le Pere，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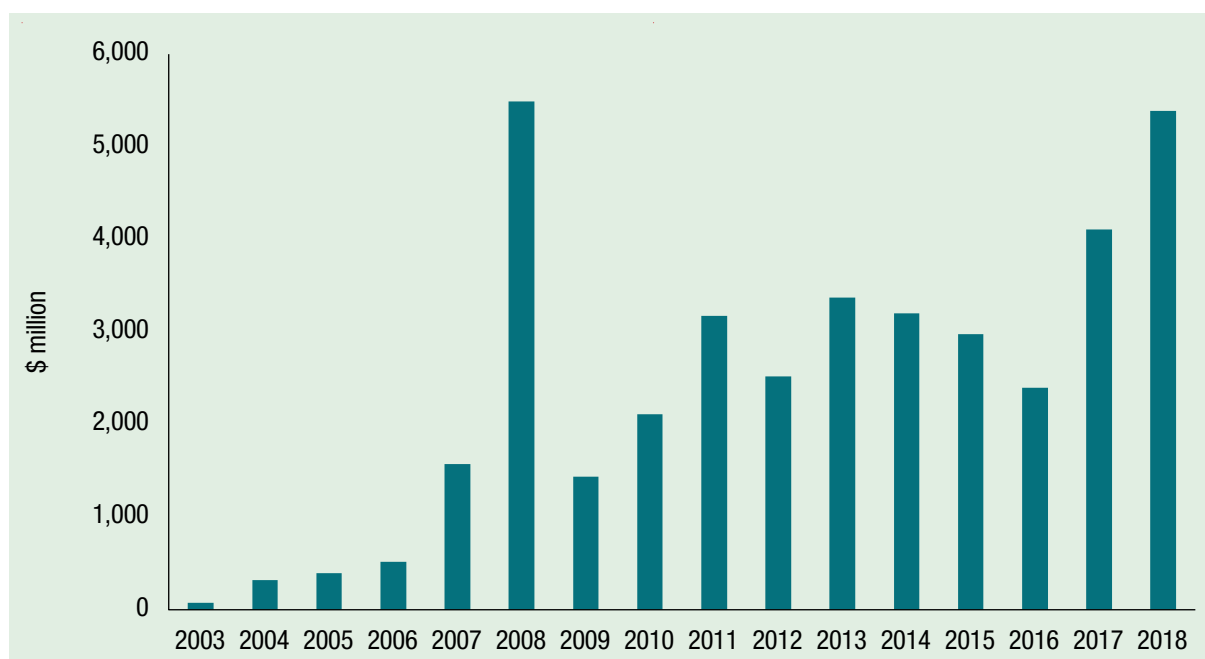
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参与度不断上升。中国是第五大外国投资者（仅次于法国、荷兰、美国和英国），2017 年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 430 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2019）。

插图 1
2000 – 2018 年非洲对华贸易进出口额和贸易余额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 (UN, N.D.)。

插图 2
2003–2018 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汇编的数据计算的结果（请参阅 WWW.SAIS-CARI.ORG/CHINESE-INVESTMENT-IN-AFRICA）

中国对非投资涵盖的行业非常值得关注。美国、英国和法国专注投资于金融服务业和采掘业，而中国企业则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采掘业和制造业（Calabrese, 2019）。在制造业方面，许多研究都强调了中国进口产品给非洲制造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Morris 和 Einhorn, 2008; Edwards 和 Jenkins, 2015）以及中国投资的松散性（Rotunno 等, 2013），而其他研究则指出，中国投资通过直接竞争和提升投入质量，提高了非洲企业的生产率（Darko 等, 2018）。在农业方面，虽然很多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对中国“抢地”的担忧上（Smith, 2009），但中国的参与也可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的传播（Brautigam, 1993; 1998）。

中国对非洲自然资源的投资及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同样引发了很多争论（Farooki 和 Kaplinsky, 2011）。中国企业经常面临各种谴责，比如开发非洲的自然资源、刺激砍伐森林（EIA, 2012; Putzel 等, 2011）、开采矿产（包括在冲突地区）

（Shinn, 2008）、带来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Farooki 和 Kaplinsky, 2011;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2011; Moyo, 2012）。这些挑战不仅影响着非洲的正式行业，还给涉及非洲大部分自然资源的非正式经济造成了影响（Weng, 2015）。中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在非洲石油行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的“石油外交”（Power 等, 2012）。

中国政府通过捐赠、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形式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国务院, 2014），但与商业合作相比，这些资金非常有限：优惠贷款约占向非洲提供的所有资金的 20%。中国提供的援助在数量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提供的援助要少（Kitano, 2019），且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但也涉及农业、医疗、能力建设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等方面（国务院, 2014）。除援助外，中国的利益相关者还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融资。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估计, 2017 年这些贷款和融资的总额约为 158 亿美元 (Brautigam 等, 2019), 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Atkins 等, 2017)。

最后, 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参与形式之一是中国海外承包项目。这些项目是中国企业实施的基础设施项目, 由中国机构或其他来源资助。对中国承包商而言, 非洲是个大市场。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CHINCA) 的数据, 2017 年, 中国企业在 54 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工程建设, 新签合同价值达 765 亿美元 (几乎是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两倍), 占当年新签合同总价值的 28.8% (CHINCA, 2018)。

目前所讨论的中国在非洲的所有参与形式 (贸易、投资、贷款和援助) 都相互关联, 错综复杂。贸易流动是双向的, 非洲国家既向中国出口, 也从中国进口。投资也是如此: 非洲企业和个人也会向中国投资, 但非洲对华投资的规模要小于中国对非投资 (Goldstein 等, 2006; Gelb, 2014)。同时, 中国政府及其机构, 包括国有企业 (SOE) 和政策性银行, 向非洲政府提供援助和贷款。海外承包项目或基础设施项目与所有这些都有关联。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通过贷款或援助来融资; 中国企业有时也可投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 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些项目中拥有一定股权 (Foster 等, 2009; Cheng, 2017)。贸易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的商品 (例如设备和机械) 通常从中国进口 (Foster 等, 2009)。

中国在非洲的参与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 引起了巨大轰动, 再加上对新来者充满怀疑, 打乱了更加成熟的贸易和投资模式。此外, 中国在非洲的参与还助长了人们对其参与性质与影响的误解和谬论。媒体和政治人物加剧了这些误解, 包括声称中国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 而且大多都提供给中国人 (Lee 和 Shalmon, 2008; 《经济学

人》(The Economist), 2014; Mekonnen, 2015; 白宫, 2015 年; Lahtinen, 2018; Paduano, 2020); 中国企业的工作条件具有剥削性质, 而且工资低 (Baah 和 Jauch, 2009; 人权观察, 2011; Lee, 2017; Rounds 和 Huang, 2017; Sun 等, 2017; Jenkins, 2018) 以及中国企业对非洲工人技能发展的贡献有限 (Baah 和 Jauch, 2009)。其他误解涉及抢地 (Smith, 2009; Moyo, 2012), 以及更常见的, 开采非洲的自然资源、剥削非洲的人力资源。

2.2. 中国在非洲参与: 风险与机遇

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和非洲的主要参与者可能会带来风险, 但也为非洲国家创造了机会, 非洲国家可以利用中国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贸易、投资和融资, 以促进开展提高生产率的活动, 并刺激经济增长。赞比亚经济学家 Dambisa Moyo 认为, 中国是非洲的“黄金机遇”, 与中国交往可以帮助非洲摆脱对援助的依赖, 走向一种更加以商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Moyo, 2012)。

中国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帮助提高生产率。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技术升级和知识溢出等方式, 提高非洲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¹。中国为急需的基础设施融资, 可能会刺激非洲和其他外国企业的进一步投资。此外, 中国企业可以在生产率较高的经济部门创造就业机会。但商业为导向的方式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例如, 如果这些方式会怂恿在工资、工作条件或环境保护方面进行“逐底竞争”。

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洲企业 (Darko 等, 2018)、更成熟的捐赠方 (Woods, 2008) 和非洲投资者促进良性竞争; 但仍不确定其程度 (Zeitz, 2015)。总体而言, 重点是中国的参与可以降低风险, 同时为非洲提供多种机会。

DEGRP 研究旨在研究中国的参与是否促进了

1 企业或人员的活动为其他行为人带来收益或损失时, 就产生了溢出效应 (或外部性)。



安哥拉莫兰巴一处建筑工地上的本地主管和中国主管，2019年。
图片来源：DAVIDE SCALENGHE

非洲的发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促进其发展。专栏 1 中讨论的 DEGRP 中非系列研究开展于 2015 年 - 2020 年。

在本综合报告中，我们仅在经济转型框架内进行讨论。经济转型的概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资源从低生产率的行业向高生产率的行业流动，即结构转型。这是指经济结构和经济成分的变化。二是行业内生产率提高，这是指经济体系中不同企业和活动的生产率提高（McMillan 等，2017）。如上所述，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可通过不同渠道在这两方面做出贡献。后续各节将对此进行探讨。

本综合报告从 DEGRP 研究结果和其他文献资料提取了证据，说明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在促进非洲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本报告后续各节将分析中国投资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虽然我们承认贸易、援助、贷款和基础设施项目在中非关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正在产生的风险，尤其是在金融可持续性方面，但本综合报告并未详细探讨这些问题。这些方面并非 DEGRP 研究的核心，因此不属于本综合报告的研究范围。

专栏 1 DEGRP 研究

DFID-ESRC 增长研究计划 (DEGRP) 为有关低收入国家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世界级科学研究提供资金。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开展与政策相关的优质研究，并促进这些研究与世界各地的主要政策制定者有效交流。多年来，DEGRP 为大量有关农业、金融、创新以及中国和非洲的研究项目提供了资金。本综合报告主要提取的是中非系列研究中的五个项目：

- Deborah Brautiga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倡议”项目）主导的“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非洲结构转型：技术转移、联系与经验” (Chinese FDI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technology transfer, linkages, and learning) 项目，调查了中国在非洲的参与通过直接培训、技术传播、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分包和人员转移促进转型的潜力。
- Giles Mohan（开放大学）主导的“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与非洲石油生产业的经济的发展”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frican oil producers) 项目，探索了中国的石油利益与非洲国家参与者和非国家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评估他们如何帮助最大限度地促进非洲的发展。该研究分析了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动机、作用和影响，以及非洲如何影响其参与。
- Carlos Oya（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导的“非洲的工业发展、工程建设和就业机会创造 (IDCEA): 一项比较分析”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in Africa (IDCE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项目，通过调查中国对非洲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了中国在非洲的参与。该项目以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建筑业和制造业为重点，从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工作条件以及非洲工人技能培养等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影响，并将中国企业和非中国企业的这些结果进行了比较。
- 宋丽娜（诺丁汉大学）主导的“地方政府、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项目，研究了中国的经验是否为非洲地方政府如何成功促进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提供了见解。该项目探讨了地方治理对中国及所选的两个东非国家（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影响。
- 翁晓雪（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前研究员）主导的“自然资源、农村贫困与中非贸易” (Natural resources, rural poverty and China-Africa trade) 项目，研究了中国在非洲自然资源行业的参与情况以及非洲自然资源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该项目重点研究了中国参与者对连接印度洋的两条快速发展的贸易走廊沿线的非正式农业、矿业和木材贸易的影响。

除中非系列研究外，本综合报告还利用了促进建立中非领域知识库的其他 DEGRP 项目。特别是傅晓岚的“低收入国家的创新传播”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项目，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贸易和投资作为创新渠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挥的作用。

3. 非洲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投资：微观证据

本节重点探讨中国企业在微观层面对东道国经济转型的作用，大致对应经济转型的“行业内”部分。我们研究了企业和行业内部发生的变化，包括就业和技能、生产率和技术、企业层面的溢出效应、工资和生计。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动态的，具体取决于各种条件，例如东道国的社会经济环境、法规、投资的行业和企业运营时间。因此，我们的研究在调查中国投资时，主要按工程建设、制造和贸易等行业展开²。

3.1. 就业和技能

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生产部门创造就业机会。聘用人员从事生产率高的活动不仅可以提高经济生产率，还可以培养工人的技能，吸引更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关注就业的 DEGRP 研究证实，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这些就业机会主要面向非洲工人。例如，Oya 和 Schaefer (2019) 发现，在他们研究的中国企业中，非洲员工占其员工总数的比例平均达 70% 至 95%。

非洲员工占中国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本地化率”）受几个因素影响。东道国的法规具有重大影响。例如，Oya 和 Schaefer (2019) 发现，埃塞俄比亚有关工作许可的法规非常严格，因此本地员工的比例高达 90% 以上；而在安哥拉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本地员工比例仅为 75% 左右。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投资的行业。Oya (2019b) 和 Tang (2019a) 均表示，与工程建设行业相比，中国投资制造业倾向于雇用更多本地工人，因为非洲的制造业通常都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工作岗位，而工程建设行业则需要技能更强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相比新

来者，在一个国家长时间经营的企业更依赖本地工人。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职业教育机会、生产的时间和质量要求以及机械安装需求。

DEGRP 研究发现，为提高非洲工人的生产率，中国企业投入了很多精力对劳动力进行培训。但培训的形式和效果大不一样。据大多数公司报告，提升当地员工技能的主要方法是边做边学或现场培训，而非正式的培训活动（Tang, 2019a; Xia, 2019a）。他们要求新聘工人在工作实践中跟着经验丰富的工人（有时是中国人，有时是经验更丰富的非洲工人）学习。虽然中国的管理者认为这种方法既实用，又具成本效益，但却有可能达不到非洲人的期望，从而留下缺乏培训的印象（Oya, 2019b）。另外，工人无法通过简单的模仿获得有关复杂机械操作的深层知识。

规模较大的中国企业通常会提供正规培训课程，特别是在制造业和电信行业。为确保工作质量，新工人要接受为期数周的缝纫、裁剪或机器操作培训，方可进入生产线。由于中国企业雇用的大多数非洲人以前都没有类似工作经验，因此大公司还会正式介绍公司规则、生产安全和员工纪律等主题，教授工业文化（Tang, 2019a; Xia, 2019b）。一些大型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了职业培训中心，进行更密集、更高级的技能教学。有时还会派非洲工人前往中国获取直接经验和相关经验以及语言培训（Oya 和 Schaefer, 2019; Tugendhat, 2020）。中国政府的援助项目还建立了一些培训非洲农民的培训中心，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Chen 和 Landry, 2016; Tang, 2019c; Xia, 2019b）。

各种研究项目都定性评估了这些培训方法对非洲生产率的影响。虽然中国的管理者认为

2 我们注意到所有权的异质性和中国投资的规模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虽然本综合报告不关注异质性，但在一些行业研究中对此有部分阐述，因为不同行业集合了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例如，工程建设企业通常是大型国有企业，而制造企业通常是中小型私营企业。

培训对流水线工作和技术岗位有所帮助，但他们也指出，由于缺乏针对不同产品型号的实践以及不了解国际市场标准，非洲工人的生产率仍然较低（Tang, 2019a）。这两方面都需要积累经验才能有所改善。然而，技能培训的最大挑战是本地工人离职率高。中国企业抱怨道，工人会因短期高薪工作或家庭问题而随意辞职，造成浪费和重复培训。工厂员工通常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成为稳定的熟练工人（Xia, 2019b）。因此，中国企业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大都是低技能和半技能型岗位。少数非洲管理人员也会负责生产和行政管理，但他们的职能主要限于在中国高管和非洲员工之间进行调解，几乎没人具备有关复杂生产系统的深层知识（Auffray 和 Fu, 2015; Xia, 2019a）。

除车间技能外，生产率的提高还与企业的管理技能水平紧密相关。一项关于中国跨国企业和欧洲跨国公司影响的比较研究特别关注了管理知识的转移，发现欧洲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Fu 等, 2019）。影响管理知识转移的不是跨国企业的国籍，而是跨国企业的结构，因为分布式企业和“扁平化”企业更有利于专有技术的转移。该研究还发现，在知识转移方面，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壁垒，中国企业比欧洲企业面临更多的挑战（Fu 等, 2019）。

3.2.企业层面的溢出效应

企业层面的溢出效应是指在企业互补关系或竞争关系中发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企业关系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学习资源。各企业可以相互竞争，向竞争对手学习；也可以向合作伙伴、客户和供应商学习。

DEGRP 研究使用详细的案例研究和访谈，来评估中国投资的非洲企业的知识溢出程度。一种方式是水平技能转移，即通过同行业公司交流和竞争。水平转移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劳动力流动，即员工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劳动力流动情况因企业而异。Xia (2019a) 发现，有些非洲工人离开中国企

业后，跳槽到了同行业的本地企业。Chen (2020) 发现，与流水线行业相比，在需要复杂生产技能和较长培训期的行业，例如家具行业，企业向本地员工转移了更多技能，赋予了更多责任。

但建筑工地和流水线的工人大都是半技能型。经验丰富的本地技术人员在非洲是稀缺资源，因而成为了外国竞争对手竞相追逐的对象。本地企业几乎没有能力抢走他们（Auffray 和 Fu, 2015; Tugendhat, 2020）。因此，尽管离职率很高，竞争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促进中非企业之间的大量知识转移。

非洲利益相关者承认，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华坚、非洲南部的中非棉业和非洲东部的特福陶瓷，为东道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管理技能（Tang, 2019c; Xia, 2019a）。这些例子具有“示范效应”，可以刺激本地竞争对手学习这些生产效率更高的实践，但很少有东道国企业能成功吸收这些知识，因为中非企业之间的能力相差太大（Auffray 和 Fu, 2015）。本地竞争对手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购买更新的设备以及确保可靠供应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资金（Tang, 2019b）。此外还发现，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具有很多隐性知识，并没有明示汇编的规章。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家难以学习复制（Auffray 和 Fu, 2015）。

与非洲竞争对手相比，其他中国企业，特别是大量中小型企业，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技术优势。因此，他们在同一水平线上竞争，竞争更加直接。Fu 等人 (2015) 发现，如此激烈的竞争确实提高了资源分配效率，将生产率低的本地企业淘汰出局，从而提高了总生产率，但他们也表示竞争没有随之推动相关行业大规模技术升级。在某些行业，例如坦桑尼亚的采矿业和埃塞俄比亚的皮革业，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受到政府法规的约束，只能在价值链的小范围内运作，因而对技术升级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Tang, 2019b;

Weng 等, 2018)。在其他行业, 例如坦桑尼亚的塑料制品业和埃塞俄比亚的建材业, 由于市场规模有限, 竞争对手没有投入巨资购买更多生产设备, 而是向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其他子行业延伸 (Tang, 2019a; Xia, 2019c)。事实证明, 本地企业通过水平渠道的学习效果不大, 且非常局限。

知识也可以沿价值链垂直转移, 即通过与本地供应商、分包商和客户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许多中国企业会从本地企业采购大量用品, 主要是皮革、木材、矿物等原材料。但还有许多工业用品无法在非洲采购, 必须进口 (Chen, 2020; Tang, 2019b)。在地方当局的鼓励下, 中国的工程建设企业经常雇佣本地分包商, 但往往只向他们分配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任务, 需要关键技术的工作则通常委托给中国分包商 (Oya, 2019b)。一些非洲国家就外国企业分包其部分工作给本地企业设立了法规, 但这些法规的效果参差不齐。一些中国企业与本地分包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而有些中国企业则抱怨与本地分包商合作困难, 并试图避开相关法规。

一些中国企业向其本地供应商和分包商提供技术和金融援助, 确保优质供应和顺利完成委托任务。有时, 他们还会派中国技术人员与供应商一起工作, 检查其生产情况。中国企业偶尔还会向本地长期供应商提供机器设备, 以巩固关系, 提高效率 (Tang, 2019b; Xia, 2019c)。华为等电信企业需要为分包商提供复杂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方法以及健康和原则方面的培训 (Tugendhat, 2020)。更常见的情况是, 中国企业只说明其需求, 然后选择东道国最具竞争力的供应商。这刺激了本地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提高产能和质量 (Tang, 2019a)。研究发现, 频繁互动的长期供应或分包关系最有利于知识转移, 因为这样的关系可以为本地企业升级提供财务稳定性和明确的目标。然而, 由于大多数本地供应商和分包商规模较小, 且仅提供简单的服务, 因此, 它们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提升空间有限 (Auffray 和 Fu, 2015)。

电信业、制造业、农业和建筑业也存在前向联系。华为注重培训客户和渠道合作伙伴, 将其作为长期业务战略的一部分, 以便与当地政府和大客户建立良好关系 (Tugendhat, 2020)。中国在非洲投资生产机器设备、加工原材料, 让本地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新型设备、配件和配料, 提高了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 (Tang, 2019c; 2019a; Wolf 和 Cheng, 2018b)。工程建设企业帮助本地客户培训技术人员操作和维护设备, 为生产活动提供关键的基础设施 (Oya 和 Schaefer, 2019)。根据这些观察, 垂直知识转移的效果比水平溢出方式 (例如示范和竞争) 的效果更加明显, 也更为广泛。但具体效果取决于中国企业服务的市场。如果出口到发达经济体, 企业通常会因质量要求高而使用更多进口物资; 如果在本地市场销售, 则倾向于在东道国采购更多物资, 以节约成本 (Tang, 2019a)。

研究发现, 中非合资企业相对较少, 平均不到中国总投资的 10%, 但事实证明, 相比其他形式的技术合作, 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行技术合作更加密切、高效。合资企业会赋予本地管理人员各种重要责任, 负责所有可能的职能, 包括销售、市场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研发和一般管理 (Chen 等, 2016; Tang, 2019a)。中国人和非洲人能够在商业战略、管理方式和技术升级方面进行密切、平等的交流 (Xia, 2019c)。在一些案例中, 大型非洲制造商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与合资企业一样, 这种形式的合作也将中国知识有效融入了本地企业 (Tang, 2019a)。

本地员工离开中国企业后成立衍生企业, 是转移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方式。Xia (2019b; 2019a) 报告称, 一名本地管理人员获得了足够资金后, 购买了一些中国摩托车装配厂专营店, 这些专营店也成为了坦桑尼亚的分销商。还有些本地技术人员自己成立了公司, 成为其曾经就职的中国企业的分包商或供应商。由于本地企业在进入

市场、获取资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中国企业欣然接受此类衍生企业，有时还会提供技术援助等支持（Schaefer 和 Oya，2019；Xia，2019c）。但资金的缺乏阻碍了更多非洲员工创办自己的公司，以及将其获得的知识用于更高层次的实践（Auffray 和 Fu，2015）。

几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南部采用承包经营模式，与成千上万家本地小型种植者合作生产棉花、烟草和大米（Chen 和 Landry，2016；Kabwe 等，2018）。与美国、新加坡和南非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为承包种植者提供系统培训或向他们传授中国耕作技术方面的能力要略逊一筹，这是因为中国与非洲的农耕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中国企业向种植者提供了具有成本效益的物资，采用务实的方法促进生产，例如支付现金、提供酸化种子。他们还与中国援助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合作，开发出了新的种子品种（Weng 等，2018；Tang，2019c）。

3.3. 生产率和技术

除培训工人外，企业还可通过投资资本品和技术来提高生产率。Wolf 和 Cheng (2018a) 认为，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扩张，大大降低了低收入国家购买资本品的成本，而这些国家的资本品价格在历史上一直过高。因此，中国对非投资不断增长，可以促进结构升级，增强工业能力。中非合作还可增强非洲与其他双边伙伴的议价能力。但他们也提出警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应采取强硬独立的工业政策，以更加充分利用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援助。

Fu 等人 (2015) 发现，对比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加纳制造企业的生产率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者认为，贸易驱动的国际化为非洲各国的企业带来了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渠道。通过参与全球生产链，本地企业便可更好地获取先进技术，例如进

口机械设备用于本地生产，引进技术型商品和服务，接受外国供应商的技术援助以及通过拆卸进口产品来学习其技术。因此，中国与加纳高度密切的进出口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加纳企业提高生产率（Fu 等，2015）。

此外，Fu 等人 (2015) 证明，由于技术差距更小，与生产能力相近的国家进行贸易更能刺激提高生产率。加纳的企业级数据集和基于贸易的行业级数据集表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提供易于让当地企业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因而让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Darko 等人 (2018) 强调了类似发现。中国的资本品与非洲生产能力的技术差距较小，因而有可能使中国的设备更适合非洲市场。尽管技术差距相对较小（如后续各节所述），但中非企业差距仍然是知识转移的主要障碍。

其他研究发现，对华贸易开放度上升似乎并未产生让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转移。在某些情况下，对华贸易开放度对非洲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³似乎还产生了负面影响（Elu 和 Price，2010）。但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又似乎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Elu 和 Price，2010）。

3.4. 工资和生计

员工工资和生计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些方面有所体现。这也是就非洲劳动力市场就业提出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企业给非洲员工支付的工资是一个主要关注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员工薪酬同样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Oya 和 Schaefer (2019) 的调查显示，工资取决于工人的技能水平、任职时间、工作经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所在行业和工作地点。如果这些因素均考虑在内，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支付的工资其实非常相近。中国企业还根

3 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单位总投入（通常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



埃塞俄比亚纺织工厂的工人正在生产服装，2019年。
拍摄：DAVIDE SCALENGHE

据社会经济情况提供了宿舍和伙食等额外福利，增加了非洲工人的实际收入。这些措施在其他国家的企业中是看不到的。华为和中兴等几家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薪资，以吸引本地人才（Tugendhat, 2020）。一些中国企业采用绩效工资来激励非洲员工（Schoneveld 等, 2018; Tang, 2019b; Xia, 2019b）。但是，与计件工资制相比，许多员工还是更喜欢固定收入，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不能保证其获得高额奖金。所有相关报告均表明，非洲员工的工资由当地劳动力市场决定。与技能、工作经验、任职时间、部门和其他影响相比，企业的国籍不会对员工的收入产生独立的显著影响。

与其他外国企业或非洲本地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倾向于雇用教育程度较低、经验较少的贫困工人，这些人通常来自农村地区。虽然农民工薪水较低，但有时会得到一些“福利工资”作为补充，包括住宿和伙食等，这使得他们可以节省开支，将更多的钱留给农村的家人（Oya 和 Schaefer, 2019）。Xia (2019b) 还发现有些中国企业向本地员工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应急。所有研究人员都证实，中国企业提供的工资远远超出了贫困

工资标准，但城市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给非洲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带来了挑战。此外，还有中国管理人员称，新聘的非洲员工很容易在一发工资就不来上班，直到把所有钱都花完才回来。因此，许多无技能和半技能型员工的生计并未明显改善。

同样，承包种植者的收入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并没有随着中国投资的增加而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虽然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种子品种和价格公道的化学品，但农作物的产量还取决于天气和自然条件。此外，由于市场价格波动，产品销售的货币收入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投资者注重降低种植者和企业的财务风险。他们采用“减少投入，增加产出”的方法，例如给棉花种子去绒、使用成本较低的除草剂，而不是通过巨额投入来提高生产率（Tang, 2019c）。中国企业还加快了非洲南部棉农的付款流程。因此，虽然中国企业的承包种植者的整体收入没有显著增长，但他们的负债较少（Weng 等, 2018）。

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和其他企业采用的低成本商业模式可能会给社会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关于非洲南部的农业、林业和矿业的系

列研究（Cerutti 等，2018；Schoneveld，2018）得出结论：新来的外国投资者在生态保护和维持保障方面的投入较少，导致自然资源储备和生物多样性逐渐下降。有些报告指出中国企业的职业危害较高、工作条件艰苦，但总体上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当（Weng 等，2018；Oya 和 Schaefer，2019）。

4. 非洲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投资：宏观证据

本节重点探讨中国企业在宏观层面对东道国经济转型发挥的作用，大致对应经济转型的“行业间”或“结构转型”部分。我们重点关注了与中国交往是否会推动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型，从而促进经济体系中更高生产率行业的建立和扩大。我们了解到，中国在非洲不同国家的投资趋势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因此，有些研究结果仅限于特定国家。

4.1. 中国的宏观转型如何影响其他地区的经济转型

中国与非洲交往（即中国企业和资本从 21 世纪初开始向外流动）的一个驱动因素，便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在此我们将综述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进而影响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与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和转型息息相关。由于工资上涨、劳动实践非正式化和劳动力减少，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巨大压力（Hou 等，2017；Qi 和 Pringle，2019）。中国经济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主要原因。一项针对中国 640 家制造企业开展的调查（Xu 等，2017）证实，工资上涨迫使行业急切寻求变革。但是，研究人员对中国工业转型将如何影响非洲持不同看法。Lin 和 Xu (2019) 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制造业的转移规模绝无仅有，可以促进非洲的工业化；有些研究则认为，非洲国家层面的制约因素（例如基础设施落后）令人生畏，让大多数中国制造商更愿意转移至其他地区或采取技术升级等其他策略（Xu 等，2017）。还有人指出，产业转移通常发生在中国境内（Ang，2018）。DEGRP 研究还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非洲，大多数中国企业是新投资，且通常面向国内市场（Wolf 和

Cheng，2018a；Tang 2019a；Xia，2019a；2019b）。这证实了 Kaplinsky 等人 (2007) 之前的研究结果。

Fu 和 Buckley (2015) 对比了全球的经验性证据，指出中国投资低收入国家对后者的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取决于中国投资与东道国条件的多重互补性，包括融资、知识、资源和竞争状况等方面。中国的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对亚洲的影响相对较小，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则微不足道。发展中经济体常常因缺乏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而发展受限，互补投资可以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让东道国可以利用劳动力、土地或资源等其他要素有效创造生产能力。

该研究还分析了中国的投资对资源丰富国家和资源不丰富国家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与中国合作给资源丰富国家立即带来了快速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投资对资源不丰富国家的增长效应甚至更大。因为中国企业使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更适用于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而不是资源或资本丰富的国家（Fu 和 Buckley，2015）。

Lo (2018) 认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资本为投机导向，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国内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生产率。因此，中国企业的到来不会导致对非洲的经济剥削，反而可以提高东道国的生产能力。然而，这些积极影响最终取决于中国深化其工业能力以及实现工业价值链上游生产部门和活动的多元化发展的程度和速度。然而，一些学者担心中国进口商品的竞争会导致非洲国家去工业化，将本地企业挤出市场（Edwards 和 Jenkins，2015；Jenkins，2018）。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进口商品的竞争会对非洲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刺激他们提高生产率，提升技能，从中国采购高质量物资投入生产（Darko 等，2018；Fu

等，2015）。

除了直接影响外，中国还会因影响全球商品价格而产生间接影响。例如，中国对矿物、金属和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会影响全球价格。价格上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会刺激外币大量流入，导致货币升值，从而使该国其他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兰病”），进而导致去工业化。西非已经发现了这种迹象。在这里，中国需求增加带来了商品市场繁荣，但伴随出现的却是农业和制造业停滞（Pigato 和 Gourdon，2014）；另一些研究则对与中国贸易导致荷兰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Berthélemy，2011）。但如果资金与从债权国进口挂钩，外汇流入与进口增加则可相抵；并且如果外国劳工被引入该国从事工作，工资和通胀压力应该很小（Christensen，2010）。

Zafar (2007) 计算了中国对 2000 年至 2005 年间全球对非洲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相对贡献，并评估了中国对各国贸易条件指数（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石油出口国和资源丰富国家（例如安哥拉、苏丹和加蓬）从中国需求增长中受益；石油进口国和农业或纺织品生产国（例如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和科特迪瓦）正在遭受损失；进口石油但出口其他自然资源的国家所受影响则错综复杂。其他影响也可能源自于外汇：中国拥有大量美元储备，会对美元产生影响，而有些非洲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Zafar，2007）。

4.2. 行业转型

中国参与非洲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可以推动经济体系中的高生产率行业的建立或扩大，从而促进结构转型。

Wolf 和 Cheng (2018a) 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矿业和制造业。中国极大地帮助了东道国积累外汇储备，促进

这些行业的技术转移。他们发现，中国在非洲投资制造业只有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雁行”迁移，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实际上，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大多数中国企业都不是要迁出中国，而是针对非洲国家国内市场的新投资。安哥拉的案例表明，中国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多样化，而安哥拉经济原本严重依赖采掘业。Wolf (2017) 和 Wolf 和 Cheng (2018b) 进一步调查了由中国开展、通常也是由中国提供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如何为建材行业开辟了有利可图的市场，并刺激非洲国家的建材生产。他们认为，非洲蓬勃发展的建筑业在经济体系中变得日益重要，促进了生产能力提高，制造了商业利益，刺激了上游建材制造业的投资需求，从而为非洲急需的经济多样化创造了一些机会。

中国企业不仅直接投资于高生产率的行业，他们还间接参与，促进填补非洲的基建空白，从而帮助消除供应瓶颈。在非洲能源生产能力建设方面，中国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中国的资助机构为其他资助机构不愿资助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因为中国的资助机构采用不同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遵循“事前建设”的理念。建材制造业的增长通常始于运输成本高昂的产品，例如水泥和钢铁。中国企业是这些新兴行业的客户兼投资者，在过去十年中推动了产业的强劲扩张（Wolf 和 Cheng，2018b）。同样，中国对电信项目的投资和融资大大加快了非洲的移动网络建设，为电子商务、软件 and 应用程序开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Tugendhat，2020）。

Weng 等人 (2018) 证明，随着中国在一些主要行业的活动增加，非洲南部的农村经济发生了显著转变。根据 Kabwe 等人 (2018) 的研究，中国和其他亚洲投资者的到来，为棉花业带来了颠覆性的结构变化，使其变得青睐低成本模式，将传统的西方企业和本地国有企业挤出市场。在林业领域，Cerutti 等人 (2018) 研究表明，仅中国的需求就开辟了紫檀 (*mukula*) 出口市场，这是赞比亚以前没



轻轨列车，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2015年。
图片来源：TURTLEWONG

有的新市场，推动了从采收、加工到交易的整个价值链的发展。同样，Schoneveld 等人 (2018) 研究显示，中小型外国投资者（通常来自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坦桑尼亚的手工业和小规模金铜开采，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专门知识。投资者不仅通过生产升级和正规化提高了成熟采金业的绩效，在开发新兴的采铜业方面，中国市场的机会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在所有案例中，行业转型都给现有治理制度带来了挑战。中国和其他参与者使用的新的商业策略要求法规、检查和辅助协调均作出相应变化。如果有关当局不及时进行调整，短期给行业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会在长期范围内增加社会和环境风险，并可能导致工业崩溃（Weng 等，2018）。

4.3.行业层面的溢出效应

行业层面的溢出效应是指中国的投资对经济行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包括集群和集聚。

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企业倾向于按行业或按地域进行集群投资。这一独特模式对非洲的行业发展和工业政策产生了影响（Brautigam 和 Tang, 2014; Tang, 2019a）。Chen 等人 (2016) 发现了好几个中国-尼日利亚经贸合作区。Keyi Tang (2019) 描绘了 2007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城外成立的东部工业区如何让埃塞俄比亚的政策制定者大开眼界，看到工业园区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因此，埃塞俄比亚政府启动了自己的园区计划。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了埃塞俄比亚新建工业园区的大部分建设工作，并为其运营提供了

帮助。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区吸收了中国的发展经验，结合了一流的设施和简化的管理流程，并提供了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者来发展所选行业（Auffray 和 Fu, 2015; Xia, 2019b; 2019a）。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可以吸引大量本地工人，并可通过出口赚取外汇，例如制衣制鞋业，因而成为被特别关注的行业。由于中国在这些行业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因此，最早在这些园区定居的租户许多都是中国投资者。同样，中国投资者也成为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各园区的主要制造商（Auffray 和 Fu, 2015; Xia, 2019a; 2019b）。

除实体园区外，中国投资者还通常会在机会出现时，集中投资某些行业。投资集中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竞争，并促进了东道国价值链的发展，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整个行业生产率的提高（Tang, 2019a）。Wolf 和 Cheng (2018a) 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愿意为提高成本效益或打入非洲国内市场而承受短期损失。这一业务战略让非洲国家获得了提高产能、扩大消费市场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消费市场基本还未发展起来，因为进口产品供应有限且成本高昂。

Fu 等人 (2015) 指出，溢出效应可能还与所在国的产业异质性有关。传统产业相对分配了更多资源，学习效应往往更大。研究发现，与技术和生产资源匮乏的非传统产业相比，加纳的传统产业（例如食品、家具、服装、纺织和木材）从对华贸易中受益更多。

4.4.为经济转型培养劳动力

本节介绍了中国对非投资如何通过促进高生产率行业的建立和扩大，来加快结构转型。但是，吸引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进入这些行业并非易事。大部分讨论的想法是，只要有工作岗位出现，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人就能上岗。但 DEGRP 研究表明，这远没那么简单。

Oya (2019a) 专注于研究中国投资在为非洲工业培养劳动力中发挥的作用。非洲工人从

生产率低的农业或非正式行业流向标准化生产的工厂岗位时，并非自主转型。这取决于地方、国家和全球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中国投资的大量涌入，极大地影响了东道国融入充满活力的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在全球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资本驱动力是寻求通过非洲欠发达市场提高生产率。同样，Lo (2018) 认为，中国在低收入国家投资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而非寻求资本收益，因此，他们更渴望也能更高效地在这些国家扩大劳动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生产需求。

Oya 和 Schaefer (2019) 利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近年来，两国获得了大量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承包项目）的研究，具体展示了劳动力如何随着经济转型和国际合作而增长。调查发现，2013 年至 2018 年两国创造的新岗位中，中国企业贡献了最大份额，有些年份贡献了超过 60% 的新岗位。由于中国的投资集中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因而能够从生产率低的自给性生产活动中吸引本地劳动力。相应的劳动制度，例如劳动力招聘方法、生产劳动力的组织和生计规定，需要加以调整，以确保这些来自农村的新工人的稳定性和生产率。中国企业通过安排民工宿舍，建设工作文化，例如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重视“集体禁欲主义”而非个人事业抱负，对新兴的劳动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 Oya (2019b) 否认了广泛主张的“中国例外论”，也就是认为中国投资者有一套独特的“劳动制度”。关键是要考虑“中国资本”的多样性，例如所有权和行业差异，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投资对非洲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此外还应考虑非洲各国在国家/社会资本关系和劳动力市场条件方面的特殊性。例如，与面向安哥拉国内市场的工厂相比，埃塞俄比亚已融入全球的中国制造商需要建立一支更有活力、更加正规的工业劳动力队伍。没有发现与投资来源国有关的“例外论”。相反，培养工业劳动力的各种途径

取决于政治经济的积累和非洲社会对全球资本驱动的反应。此外，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出现了新的劳资冲突。资本主义生产系

统的转移伴随着劳资冲突的转移，这是一种全球性现象。

5. 政治与机构

第3节和第4节表明，中国的投资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发展现有行业之间的联系（尽管有时程度有限），还促进建立了新的高生产率行业。阅读这些章节中强调的研究结果时，需要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DEGRP开展的许多研究发现，当地制度影响了国家及其内部利益相关者从外国投资中受益的方式，决定了谁“输”谁“赢”。

有些案例中，中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的到来对现有关系、结构和行业条件的改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例如坦桑尼亚的矿业和赞比亚的林业，在中国投资者到来之前，非洲的小型矿场和伐木场就已经处于法律灰色地带。他们面临的负面影响归因于他们的既有条件和旨在支持他们的法律的普遍弱点，而不是因为中国投资者的到来（Cerutti等，2018；Schoneveld等，2018；Weng等，2018）。Oya和Schaefer（2019）强调，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劳动力市场成果不完全是因为中国企业，还与政府制定的劳动制度法规有关。

在有些案例中，中国的参与只是行动发生的背景。例如，Mohan等人（2017）在分析加纳石油行业时，讨论了与石油行业相关的政府间冲突和政治反对行动。虽然与一家中国石油企业的潜在交易是所述事件的背景之一，但它们几乎不相关——决定冲突结果的最重要因素是两个政治联盟的利益和观念。

在其他案例中，现有的权力关系和激励结构或政府层面的能力限制，也影响了中国参与的结果。关于矿业、农业和林业的系列研究发现，监管机构的监管和执行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尤其是对靠近农业生产地的地表监管。此外，激励机制导致许多政策官员倾向于维持现有政策实践的空白（Cerutti等，2018；Kabwe等，2018；Schoneveld等，2018；Weng等，2018）。这些研究表明，不仅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某些情况下，传统主管部门对确定谁从中国投资中受益以及如何

受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赞比亚的林业，传统主管部门不仅控制了土地和木材资源，还是本地伐木场的出资人、贸易商和动员者（Cerutti等，2018）。

该研究不仅强调了东道国背景的重要性，也强调了了解中国背景的必要性。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Musacchio和Lazzarini，2016；Naughton和Tsai，2015）、国内问题和政策影响着中国对外参与的方式，对非洲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中国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融资模式，中国的融资机构（通常是政府或国家所有的实体）对资本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因此，中国资本不追求短期收益，更有利于长期发展。政府补贴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融资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策性银行，其额外目标是为中国商品和服务开辟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基础设施交易既有经济考量，也有地缘政治考量，既考虑了政策因素，又开辟了市场（Mohan和Tan-Mullins，2019）。

在有些国家/地区，政治精英利用中国出资和建设的基础设施来增强对自己联盟的支持，因为这些项目通常会迅速签署实施，让他们能取得共识。但是，在有些案例中，这些基建项目带来的好处可能仅限于当权者。通过研究加纳和柬埔寨的两个案例，Mohan和Tan-Mullins（2019）注意到，基建项目简直就是空间上的飞地，本地生产很少或缺乏竞争。这可能会给精英带来好处，但不一定惠及民众。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DEGRP研究也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参与与其他国家的趋势和动态大都相似，特别是在私营部门。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开展的研究表明，就劳动力市场结果而言，中国企业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外国企业基本相似，驳斥了“中国例外论”（Oya和Schaefer，2019）。同样，一项关于坦桑尼亚

矿业的研究强调，中国企业的行为与市场上其他新进入者的行为相差无几（Schoneveld 等，2018）。这些案例研究表明，企业的国籍并不能有效预示其商业行为。

总之，解读中国企业的运作方式时，需要结合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它们影响了这些企业“走出去”的动机及其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与非洲参与者的交往方式与其他外国企业通常也很相似，交往结果也是如此。

最后，许多 DEGRP 研究均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腐败

的表现方式不同（Gaggero 等，2018）。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在农村地区的监管和执法能力薄弱，这也意味着其治理框架容易被外国投资者和寻租的当地政治经济精英滥用。腐败行为在矿业、农业和林业部门开展的研究中经常被提及，但腐败并非中国投资者特有，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以及当地交易商和代理均有参与贿赂的行为（Weng 等，2018）。该研究发现，一些中国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投资者通过贿赂解决违规相关问题时的速度和开放态度；研究中接受采访的中国企业认为他们只是在适应当地环境（Schoneveld 等，2018；Weng 等，2018）。



安哥拉凯兰巴一处建筑工地上本地工人和中国工人，2019年。图片来源：DAVIDE SCALENGHE

6. 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空白

DEGRP 委托开展的研究带来了极具价值的开拓性分析，让我们能够更好、更细致地了解中国在非洲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并提供了坚实的证据。DEGRP 项目获得了新的开创性发现，解释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有证据。本综合报告突出强调下列主要发现。

- DEGRP 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现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给非洲工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本地化率很高。这些工作大都是低技能和半技能型岗位。研究发现，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和本地化程度因国家和行业特点而异，但总体而言，对创造就业机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方面，DEGRP 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比较视角，从不同国家、行业和企业类型探讨了这些问题，并将中国企业和非中国企业进行了对比。
- 据发现，中国企业会培养东道国工人的技能。中国企业通常会提供某种形式的培训（正式程度各异），但较复杂的技术和管理任务通常仍由中国员工负责。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与欧洲企业在管理知识转移方面没有差异。
- 水平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程度有限。对于非洲企业而言，吸收中国同行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仍然比较困难。这与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劳动力流动性较小以及资本获取能力有限有关。
- 在垂直溢出方面，DEGRP 研究表明，通过建立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垂直知识转移，比通过示范和竞争的水平转移更有效。尽管长期的供应或分包关系非常有益于提高非洲企业的生产率，但现在这种关系很少见。同样，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例如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是例外而非常规。这一发现对我们理解中国在非洲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价值，因为垂直溢出效应是外国投资提高东

道国生产率的主要方式之一（te Velde, 2019）。

- 在薪酬和工人生计方面，DEGRP 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与其他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没有差异。据发现，中国企业有时会向工人提供非工资福利，例如住宿或经济支持。
- 中国的参与对非洲的生计，特别是非正式行业的生计，并非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负面影响往往不只是发生在与中国投资者的关系中，在与其他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同样存在。DEGRP 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企业参与非洲的方式并不独特，与其他新兴参与者非常相似。这表明该行业存在潜在弱点，不能支持生计，因此应该呼吁在行业/东道国层面寻求解决方案，而非将矛头指向中国企业。
- 在宏观层面，DEGRP 研究突出表明，中国投资往往有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过投资于生产行业（制造业）。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投资还有助于促进现有行业（建材制造业）或建立新行业（赞比亚的紫檀）。虽已广泛讨论了中国企业对非洲工业化的贡献（Qobo 和 le Pere, 2018 年；Lin 和 Xu, 2019 年），但 DEGRP 研究强调了中国的参与如何出人意料地帮助建立了新的行业。
- DEGRP 开展的许多研究证实，总体而言，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而非出口导向型；确认了早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Kaplinsky 等, 2007 年）。这表明中国投资者并不将非洲国家视为为第三方市场生产产品的低成本目的地，而是认为其本身即可作为切实可行的市场。因此，中国投资的贡献似乎不是促进了非洲的出口，而是为非洲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渠道获得更便宜的商品。

- 中国投资可以帮助疏通经济增长瓶颈。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开展进一步的经济活动，并产生溢出效应。例如，在许多非洲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园区。
- 对华贸易对非洲国家经济转型的影响似乎比较复杂。商品出口增加看似有利于商品出口商，但也在非洲某些地区（尤其是西非）造成了“荷兰病”。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已经与非洲工业形成竞争，并给后者造成负面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前者也促进了良性竞争。从中国进口机械也使非洲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 DEGRP 研究进一步表明，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个构成要素同时发挥作用。资源（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受特定国家和行业条件的影响，需要同时解决这些条件。
- 最后，DEGRP 研究加深了我们的理解——研究结果受研究环境和所涉利益相关者的特征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了解特定非洲国家的当地情况；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投资者和金融家的具体特征，以及他们的动机和惯用做法也应成为分析的对象。

总体而言，DEGRP 研究帮助我们加深理解了中国利益相关者在非洲运营和参与的方式及其与其他企业的异同。解读中国企业的运作方式时，需要结合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这会影响这些企业“走出去”的动机及其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与非洲参与者的交往方式与其他外国企业通常也很相似，交往结果也是如此。

本研究对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讨论了政策制定者和出资机构需要考虑的要点：

- 建立联系需要有针对性的支持。虽然创造了就业机会，但非洲企业发现很难与中国企业建立联系。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机制和政策工具，以促进在中非企业之间建立

这些联系，增强他们的合作能力。

- 促进沿着价值链发展，而非孤立的项目。研究表明，通过建立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垂直知识转移，比通过示范和竞争的水平转移更有效。因此，制定政策时应重点关注将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与本地上下游企业联系起来，因为这将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本地生产能力的提高，并帮助让外国投资者投资更长时间。农业领域存在这样的成功示例，特别是在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的农业技术转移合作伙伴计划 (AgriTT) 项目中，该项目主要是在英国、中国、乌干达和马拉维之间开展多边技术转移合作 (Buckley, 2017)。
- 考虑支持合资企业和其他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研究表明，尽管中非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和其他长期合作方式极具潜力，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支持这种伙伴关系可能是加强知识转移的有用途径。
- 培养管理技能，鼓励劳动力流动。虽然中国企业帮助低技能和半技能型员工培养技能，但仍不具备更高端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但后者似乎更加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对企业有利，还可促进产生溢出效应。例如，孟加拉国的成衣业快速发展是源于技能型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流动，突出了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 (Balchin 和 Calabrese, 2019)。同理，非洲国家可以鼓励劳动力流动。
- 监管规避恶性竞争。由于中国投资者经常运用新的商业模式破坏现有市场惯例，因此，地方当局应加强治理和监管，维持健康的市场秩序，例如，制定有关社会环境职责的要求，实行行业最低工资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监管，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逐底竞争”。
- 了解并针对性地吸引中国投资。一些研究还表明，除为所有外国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外，一些特定因素对于针对性地吸引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非常重要。针对性的政策是对一般扶持政策的必



要补充。DEGRP 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中国投资的目的是进入当地市场，而非追求较低的出口成本。针对性的招商引资应考虑这一点，考虑国内市场的机会。

- 注重后期服务并维持良好的投资环境，留住投资者。由于中国国内成本上升和/或对当地市场的兴趣增加，中国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到非洲投资，但是，恶劣的投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政策经常令非洲的中国投资者感到沮丧。这也破坏了名声，让其他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打造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将有助于非洲国家留住投资。
- 关注非正式行业有助于改善民生。许多非洲国家的非正式行业为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专注于特定的外国投资者群体，不如采取针对整个行业/价值链的措施改善非正式行业经营者的生计。

DEGRP 研究还强调了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 当前经济模式的弹性。当前的模式是通过

价值链参与，依赖（有时比较松散）投资，使国家容易受到冲击。一场冲击或危机，例如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可能会摧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增长和进步。疫情将如何影响中国与非洲的价值链整合？哪些参与模式可以创造更具弹性的经济增长？

- 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理解，但需要更多证据说明这种联系为什么不会发生，以及更重要的，如何使之发生。哪些政策、投资和行业条件可以刺激建立联系？如何复制？哪些因素阻止中国企业与非洲建立合资企业？我们可以向哪些国家学习？
- DEGRP 研究在建立比较证据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突出表明，那些被认为是中国投资者独有的特征，实则为各类投资者的共同特征。这表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例如关于联系、基础设施融资、技能等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建立证据，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特别是，将在不同国家运营的中国企业进行比较可能会很有趣。

- 比较研究还可以考虑非洲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发挥的作用。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经济特区是否比以前在非洲发展工业园区的尝试更加成功？如果是，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 随着线上业务的蓬勃发展，中国正在经历

经济大转型。数字“新经济”的影响已经波及非洲，因为华为、中兴、阿里巴巴、OPay 和 Kilimall 等科技公司都在迅速进入非洲市场。他们不仅带来了数百万美元资本改善电信基础设施，还为众多本地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创造了新的商机。

参考文献

Ang, Y.Y.(2018) 国内雁行：中国的产业转移和政策传播延缓 [‘Domestic flying gees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delayed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 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234: 420–443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8000516>)

Atkins, L., Brautigam, D., Chen, Y. and Hwang, J. (2017)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Challenges of and opportunities from the commodity price slump’] 经济公报 (*Economic Bulletin*) 第 1 期. 华盛顿特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9f85883ec212d5a70e9624c/1509447812591/bulletin+v5.pdf)

Auffray, C. and Fu, X. (2015) 中国的跨国公司与非洲的管理知识转移：以加纳建筑业为例 [‘Chinese MNEs and managerial knowledge transfer in Africa: the case of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Ghana’]. 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杂志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3(4): 285–310 (<https://doi.org/10.1080/14765284.2015.1092415>)

Baah, A.Y. and Jauch, H. (eds) (2009)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从劳动力角度探讨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a labour perspective’]. 阿克拉和温得和克：非洲劳动研究网 (African Labour Research Network)

Balchin, N. and Calabrese, L. (2019) 比较研究各国的纺织服装业发展：坦桑尼亚的经验教训 [‘Comparative country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xtile and garment sectors: lessons from Tanzania’]. 海外发展研究所报告 (ODI Report). 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 (ODI) (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2694.pdf)

Berthélemy, J.C. (2011) 中国在非洲的参与情况和援助效果 [‘China’s engagement and aid effectiveness in Africa’]. 非洲开发银行工作报告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第 295 期. 突尼斯：非洲开发银行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Working%20129.pdf)

Brautigam, D. (1993) 南南技术转移：以中国在利比里亚 Kpatawee 社区的大米项目为例 [‘South-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case of China’s Kpatawee rice project in Liberia’]. 世界发展 (*World Development*) 21(12): 1989–2001 ([https://doi.org/10.1016/0305-750X\(93\)90071-G](https://doi.org/10.1016/0305-750X(93)90071-G))

Brautigam, D. (1998) 中国的绿色革命：西非的技术 [‘China’s green revolution: technology in West Africa’]. 由 D. Brautigam 编辑. 中国的援助与非洲的发展：出口绿色革命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 第 1 版. 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 第 101–138 页

Brautigam, D. and Tang, X. (2014) “组团走向全球”：中国在海外建设的经济特区 [‘“Going global in groups”: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verseas’]. 世界发展 (*World Development*) 63: 78–91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3.10.010>)

Brautigam, D., Hwang, J., Link, J. and Aker, K. (2019) 中国对非贷款数据库 [‘Chinese loans to Africa databas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电子数据库 ([http://www.sais-cari.org/data#~:text=Loan%20Database,%20Downed%20enterprises%20\(SOEs\)](http://www.sais-cari.org/data#~:text=Loan%20Database,%20Downed%20enterprises%20(SOEs)))

Buckley, L. (2017) 农业三边合作：农业技术转移合作伙伴计划的成就和教训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e: achievements and lessons from AgriTT’].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报告 (IIED Report). 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ubs.iied.org/pdfs/GQ04145.pdf)

Calabrese, L. (2019) 中国在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 [‘Chinese OFDI in Africa’]. 由 E. Dussel Peters 编辑. 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条件和挑战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nditions and challenges*), 第 1 版. 墨西哥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络 (Academic Network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on China), 第 61–85 页

Cerutti, P.O., Gumbo, D., Moombe, K. 等. (2018) 非正式、全球资本、农村发展和环境：中国与赞比亚之间的紫檀 (mukula) 贸易 [‘Informality, global capit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ukula (rosewoo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Zambia’]. 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ww.cifor.org/knowledge/publication/6826/)

Chen, Y. (2020) “中国在非洲”：后石油繁荣时期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制造业投资和技术转移渠道 [‘“Africa’s China”: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Nigeria in the post-oil boom era and channels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政策简报 (Policy Brief) 第 43 期.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ea8679f7baaa53d7a3bd4c/1588094880616/PB+43+-+Chen+-+Manufacturing+Nigeria.pdf)

Chen, Y. and Landry, D.G. (2016) 亚非交界：中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农业和制造业投资 [‘Where Africa meets Asia: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Madagasca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SAIS-CARI Working Paper) 第 5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83dca44f7e0ab61352d9387/1480444486164/CARI%2BWP%2B05+Madagascar.pdf)

Chen, Y., Sun, I., Ukaejiro, R.U. 等. (2016) 向中国学习？尼日利亚的制造业、投资和技术转移 [‘Learning from China?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Nigeria’].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讨论报告 (IFPRI Discussion Paper) 第 01565 期. 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ww.ifpri.org/publication/learning-china-manufacturing-investment-and-technology-transfer-nigeria)

Cheng, C. (2017) “造血”金融：“一带一路”升级非洲发展方式 [‘Blood-cell’ finance: the ‘belt and road’ upgrades Africa’s development model’]. 研究报告第 23 期.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CHINCA) (2018)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2017–2018 [‘Annual report on China 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tracting 2017–2018’]. 北京：商务部 (Ministry of Commerce) 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China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www.chinca.org/CICA/DROCEI/TP/19030614463611)

Christensen, B.V. (2010) 中国在非洲：从宏观经济角度探讨 [‘China in Africa: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全球发展中心工作报告 (CGD Working Paper) 第 230 期. 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ww.cgdev.org/publication/china-africa-macroeconomic-perspective-working-paper-230)

Darko, C., Occhiali, G. and Vanino, E. (2018) 中国人来了：从企业层面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口竞争和绩效 [‘The Chinese are here: firm level analysis of import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Nota di Lavoro 14.2018. 米兰：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www.feem.it/m/publications_pages/ndl2018-014.pdf)

Edwards, L. and Jenkins, R. (2015) 中国进口渗透对南非制造业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 penetration on the South Afr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发展研究杂志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1(4): 447–463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4.983912>)

环境调查署 EIA (2012) 破坏欲：中国的非法木材贸易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China's trade in illegal timber].伦敦：环境调查署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global.org/reports/appetite-for-destruction-chinas-trade-in-illegal-timber)

Elu, J.U. 和 Price, G.N.(2010) 中国是否将提高生产率的技术转移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自制造企业的证据：中国是否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转移了提高生产率的技术？ [Does China transfer productivity enhancing technology to sub-Saharan Africa?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does China transfer productivity enhancing technology to sub-Saharan Africa?].非洲发展评论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2(s1): 587–598 (<https://doi.org/10.1111/j.1467-8268.2010.00260.x>)

Fan, S., Zhang, L. 和 Zhang, X. (2004) 中国农村的改革、投资与贫困 [Reforms, investment,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2): 395–421 (<https://doi.org/10.1086/380593>)

Farooki, M. 和 aplinsky, R. (2011) 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世界资源行业的破坏 [The impact of China on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the disruption of the world's resource sector].英国阿宾登：劳特利奇出版社 (Routledge)

Foster, V., Butterfield, W., Chen, C. 和 Pushak, N. (2009) 架桥：中国作为非洲基础设施融资方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Africa].趋势与政策选择 (Trends and Policy Options) 第 5 期.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和公共私营基础设施顾问部门 (World Bank and Public –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36991468023953753/Building-bridges-Chinas-growing-role-as-infrastructure-financier-for-Sub-Saharan-Africa)

Fu, X. 和 Buckley, P.J.(2015) 多重互补性以及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Multi-dimensional complementarities and the growth impact of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on h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报告 (TMCD Working Paper) 第 69 期.牛津：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entre for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www.oxfordtmcd.org/publication/multi-dimensional-complementarities-and-growth-impact-direct-investment-china-host)

Fu, X., Essegbey, O. 和 Frempong, G. (2019) 跨国公司、本地能力建设和发展 [Multinationals, local capacity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切尔德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Fu, X., Hou, J. 和 Mohnen, P. (2015) 中非贸易对非洲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加纳的证据 [The impact of China-Africa Trade on the productivity of African firms: evidence from Ghana].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报告 (TMCD Working Paper) 第 70 期.牛津：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entre for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www.oxfordtmcd.org/publication/impact-china-africa-trade-productivity-african-firms-evidence-ghana-xiaolan-fu-jun-hou)

Gaggero, A., Appleton, S. 和 Song, L. (2018) 贿赂行为的框架效应：来自中国 and 乌干达的实验证据 [Framing effects on bribery behaviour: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Uganda]. 经济科学协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 4(1): 86–97 (<https://doi.org/10.1007/s40881-018-0049-2>)

Gelb, S. (2014) 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与金砖四国的联系 [South Afric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nks with the BRIC countries]. 瑞士联邦政府经济事务司工作报告 (SECO Working Paper) 第 10/2014 期.伯尔尼：世界贸易研究所 (World Trade Institute) (www.wti.org/media/filer_public/58/2d/582da615-b85e-49d4-8968-e5d56dd0f244/wti_seco_wp_10_2014.pdf)

Goldstein, A., Pinaud, N., Reisen, H. 和 Chen, X. (2006)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非洲有何指导意义？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政策见解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olicy Insights) 第 19 期.巴黎：经合组织出版社 (OECD Publishing) (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the-rise-of-china-and-india_24661617271)

Heilig, G.K., Zhang, M. 和 Long, H. (2006) 中国的扶贫对发展中国家有何经验教训？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 lesson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地理评论 (Geographische Rundschau) 国际版 2(2): 4–13

Hou, J., Gelb, S. 和 Calabrese, L. (2017) 中国制造业就业转移 [The shift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China].支持经济转型背景报告 (SET Background Paper).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支持经济转型部 (Suppor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DI) (set.odi.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SET-China-Shift-of-Manufacturing-Employment-1.pdf)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2011) 拒绝就会被解雇：赞比亚的中国国有铜矿剥削劳工 [You'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 labor abuses in Zambia's Chinese state-owned copper mines].纽约：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zambia1111ForWebUpload.pdf)

Jenkins, R. (2018) 中国如何重塑全球经济：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的影响 [How China is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development impacts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bwe, S., Mutambara, J., Mujeyi, K. 等.(2018) 承包种植与非正式性：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驱动因素和治理对策 [Contract farming and informality: drivers and governance responses in Zambia and Zimbabwe].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研究报告 (IIED Research Report).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ubs.iied.org/17617IIED)

Kaplinsky, R., McCormick, D. 和 Morris, M. (2007)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Saharan Africa].发展研究所工作报告 (IDS Working Paper) 第 291 期.英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opendocs.ids.ac.uk/opendocs/handle/20.500.12413/4142)

Kitano, N. (2019) 中国的对外援助估算：2017–2018 年初步数据 [Estimating China's foreign aid: 2017–2018 preliminary figures].东京：国际协力机构研究所 (JICA Research Institute) (www.jica.go.jp/jica-ri/publication/other/I75nbg000018z3zd-att/20190926_O1.pdf)

Lahtinen, A. (2018) 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和经济活动：关系不断进展 [China's diplomacy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Africa: relations on the move].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

Lee, C. K. (2017) 中国全球化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动力和外国投资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e, H. 和 Shalmon, D. (2008) 寻找石油：中国在非洲的石油战略 [Searching for oil: China's oil strategies in Africa]. 由 R.I.Rotberg 编辑.中国走进非洲：贸易、援助和影响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第 1 版.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第 109–136 页

Lin, J.Y., Cai, F. 和 Li, Z. (1996) 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沙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in, J.Y. 和 Xu, J. (2019) 中国的轻工制造业与非洲的工业化 [China's light manufacturing and Africa's industrialization]. 由 A. Oqubay 和 J.Y.Lin 编辑.中国与非洲和经济转型 (China–Africa and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第 265–281 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 D. (2018) 中国对后发工业化的系统影响：批判性评估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ystematic impact on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 critical appraisal].非洲工业发展、建筑和就业工作报告 (IDCEA Working Paper) 第 1 期.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www.soas.ac.uk/idcea/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file139039.pdf)

McMillan, M., Page, J., Booth, D. 和 te Velde, D.W.(2017) 支持经济转型：方案报告 [Suppor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 approach paper].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支持经济转型部 (Suppor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DI) (set.odi.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SET-approach-paper-WEB_FINAL_MARCH.pdf)

Mekonnen, A. (2015) 西方国家和中国在非洲：没有正义的文明 [The West and China in Africa: civilization without justice].俄勒冈州尤金：Wipf & Stock 出版社

Mohan, G., Asante, K.P. 和 Abdulai, A.-G. (2017) 加纳石油的党派政治和政治经济 [Party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hana's oil]. 新政治经济学 (New Political Economy) 23(3): 274–289 (<https://doi.org/10.1080/13563467.2017.1349087>)

Mohan, G. 和 Tan-Mullins, M. (2019) 南南基础设施发展的地缘政治：中国在南半球资助的能源项目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South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hinese-financed energy projects in the global South]. 城市研究 (*Urban Studies*) 56(7): 1368–1385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8794351>)

Morris, M. 和 Einhorn, G. (2008) 全球化、福利和竞争力：中国进口商品对南非纺织与服装业的影响 [Globalisation, 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impacts of Chinese imports on the South African clothing and textile industry]. 竞争与变革 (*Competition and Change*) 12(4): 355–376 (<https://doi.org/10.1179/102452908X357301>)

Moyo, D. (2012) 赢家通吃：中国抢夺资源及其对世界的意义 [*Winner take all: China's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纽约：Basic Books 出版社

Musacchio, A. 和 Lazzarini, S.G. (2016) 中国例外论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新形式 [Chinese exceptionalism or new global 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 由 B.L.Liebman 和 C.J.Milhaupt 编辑. 监管有形之手：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含义 (*Regulating the visible h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第 1 版.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 403–431 页

Naughton, B. 和 Tsai, K.S. (2015) 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和中国奇迹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ya, C. (2019a) 在埃塞俄比亚培养工业劳动力 [Building an industrial workforce in Ethiopia]. 由 F. Cheru, C. Cramer 和 A. Oqubay 编辑. 牛津手册 - 埃塞俄比亚经济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thiopian Economy*), 第 1 版.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 669–686 页

Oya, C. (2019b) 中国与非洲的劳动制度和工作环境冲突 [Labour regimes and workplace encounter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由 A. Oqubay 和 J.Y.Lin 编辑. 中国与非洲和经济转型 (*China-Africa and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第 1 版.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 239–262 页

Oya, C. 和 Schaefer, F. (2019) 非洲的中国企业与就业动态：一项比较分析 [*Chinese firms and employment dynamics in Af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综合报告 (Synthesis Report). 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aduano, S. (2020) 鲍里斯·约翰逊重新争夺非洲 [Boris Johnson's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1 月 29 日. (foreignpolicy.com/2020/01/29/boris-johnsons-new-scramble-for-africa/)

Pigato, M. 和 Gourdon, J. (2014) 中国对西非贸易增长和发展援助增加的影响 [*The impact of rising Chinese trad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West Africa*]. 非洲贸易实践工作报告 (Africa Trade Practice Working Paper) 第 4 期. 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World Bank) (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8961)

Power, M., Mohan, G. 和 Tan-Mullins, M. (2012) 中国在非洲的资源外交：为发展提供动力？ [*China's resource diplomacy in Africa: powering development?*]. 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

Power, M. 和 Mohan, G. (2010) 中国参与非洲发展的重要地缘政治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frican development]. 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15(3): 462–495 (<https://doi.org/10.1080/14650040903501021>)

Putzel, L., Assembe-Mvondo, S., Bi Ndong, L.B. 等. (2011) 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与刚果盆地的森林：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的范围界定研究综合报告 [*Chi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forests of the Congo Basin: synthesis of scoping studies in Cameroon,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Gabon*].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工作报告 (CIFOR Working Paper) 第 67 期. 茂物：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67Putzel.pdf)

Qi, H. 和 Pringle, T. (2019) 综述“走出去”政策背景下的中国劳工实践，重点研究建筑业和成衣业 [A review of labour practices in China with a focus on construction and garment industr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Going Out' policy]. 非洲工业发展、建筑和就业工作报告 (IDCEA Working Paper) 第 6 期. 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Qobo, M. 和 le Pere, G. (2018) 中国对非洲工业化发挥的作用：建立全球价值链的挑战 [The role of China in Africa's industrialization: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global value chains]. 当代中国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110): 208–223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8.1389016>)

Ravallion, M. (2008) 中国成功脱贫的经验对非洲有用吗？ [*Are there lessons for Africa from China's success against poverty?*] 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第 4463 期. 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World Bank) (elibrary.worldbank.org/doi/pdf/10.1596/1813-9450-4463)

Rotunno, L., Vézina, P.-L. 和 Wang, Z. (2013) (中国) 非洲服装出口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African apparel exports]. 发展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5: 152–163 (<https://doi.org/10.1016/j.jdevco.2013.08.001>)

Rounds, Z. 和 Huang, H. (2017) 我们没什么不同：比较研究肯尼亚中美企业的劳资关系 [*We are not so differ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at Chinese and American firms in Kenya*].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10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8da9416e4fcb5845eb6da4a/1490719767135/zander+vl.pdf)

Schaefer, F. 和 Oya, C. (2019) 埃塞俄比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模式和条件：比较分析道路建设和轻工制造业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conditions in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n Ethiop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oad building and light manufacturing sectors*]. 非洲工业发展、建筑和就业研究报告 (IDCEA Research Paper). 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www.soas.ac.uk/idcea/publications/reports/file41205.pdf)

Schoneveld, G., Chacha, M., Njau, M., Jønsson, J., Cerutti, P.O. 和 Weng, X. (2018) 坦桑尼亚矿产经济中新非正式性：通过外国投资改变手工开采业？ [*The new face of informality in the Tanzanian mineral economy: transforming artisanal mining through foreign investment?*].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研究报告 (IIED Research Report). 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ubs.iied.org/17614IIED/)

Shinn, D.H. (2008) 军事与安全关系：中国、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Military and security relations: China, Afric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由 R.I.Rotberg 编辑. 中国走进非洲：贸易、援助和影响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第 1 版.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第 155–196 页

Shinn, D.H. (2019) 历史背景下的中非关系 [China-Africa ties in historical context]. 由 A. Oqubay 和 J.Y.Lin 编辑. 中国与非洲和经济转型 (*China-Africa and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第 1 版.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 61–83 页

Smith, D. (2009) 粮食热销：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需求增长推动非洲的土地争夺战 [The food rush: rising demand in China and west spark African land grab]. 卫报 (The Guardian), 7 月 3 日 (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09/jul/03/africa-land-grab)

国务院 (State Council) (2014) 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4) [China's foreign aid (2014)]. 白皮书. 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8/23/content_281474982986592.htm)

Sun, I.Y., Jayaram, K. 和 Kassiri, O. (2017) 龙狮齐舞：非洲和中国的交往进展如何，这种伙伴关系将如何发展？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华盛顿特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Middle%20East%20and%20Africa/The%20closest%20look%20yet%20at%20Chinese%20economic%20engagement%20in%20Africa/Dance-of-the-lions-and-dragons.pdf)

Tang, K. (2019) 东亚的经验教训：比较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早期经济特区的发展 [Lessons from East Asia: comparing Ethiopia and Vietnam's early-stage special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26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cd2a848165f5c5cf8ba68/1557932677135/WP-2019-05-Tang-Ethiopia-and-Vietnam-SEZ.pdf)

Tang, X. (2019a) 中国制造业投资和知识转移：埃塞俄比亚报告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 report from Ethiopia].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24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cdc2a67db95690001cb7c38/1557932648145/WP-2019-03-Tang-Ethiopia-Manufacturing.pdf)

Tang, X. (2019b) 出口、就业或生产率？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皮革与皮革制品行业的投资 [Export, employment, or productivity? Chinese investments in Ethiopia's leather and leather product sectors].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32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ang, X. (2019c) 中国投资对赞比亚和马拉维棉花业技能培养与技术转移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vestment on skil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Zambia and Malawi's cotton sector].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23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经济学家 (The Economist) (2014) 与中国交往的总统 [The president on dealing with China]. 经济学家 (The Economist), 8 月 2 日 (www.economist.com/blogs/democracyinamerica/2014/08/economist-interviews-barack-obama-1)

白宫 (The White House) (2015) 奥巴马总统向非洲人民发表讲话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people of Africa]. 白宫办公厅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7 月 28 日. 华盛顿特区：白宫 (The White House) (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7/28/remarks-president-obama-people-africa)

Tugendhat, H. (2020) 华为如何在非洲取得成功：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培训和知识转移 [How Huawei succeeds in Africa: training and knowledge transfers in Kenya and Nigeria].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34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2019) 世界投资报告 2019：经济特区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special economic zones]. 纽约：联合国出版物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9_en.pdf)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年代不明)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database'). 联合国统计局 (UN Statistics Division) 电子数据集 (<https://comtrade.un.org/>)

Velde, D.W. te (2019) 增强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Enhancing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支持经济转型部 (Suppor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DI) (setodi.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Enhancing-Spillovers-from-Foreign-Direct-Investment-March-2019-1.pdf)

Weng, X. (2015) 农村非正式经济：了解农业、木材业和矿业的驱动因素和生计影响 [The rural inform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drivers and livelihood impacts in agriculture, timber and mining].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工作报告 (IIED Working Report). 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ubs.iied.org/16590IIED/Pp=1)

Weng, X., Buckley, L., Blackmore, E. 等. (2018) 中国投资和非洲的小型生产商：破坏与机会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Africa's small-scale producers: disruptions and opportunities].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研究报告 (IIED Research Report) 第 13605 期. 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ubs.iied.org/13605IIED/)

Wolf, C. (2017) 中国时代的工业化：安哥拉国内市场的形成 [Industrialization in times of China: domestic-market formation in Angola]. 非洲事务 (African Affairs) 116(464), 435–461. <https://doi.org/10.1093/afraf/adx015>

Wolf, C. 和 Cheng, S.-K. (2018a) 中国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雁行转移还是资源殖民主义？ [Chinese FDI in Angola and Ethiopia: between flying geese and resource colonialism?]. 非洲工业发展、建筑和就业工作报告 (IDCEA Working Paper) 第 02 期. 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www.soas.ac.uk/idcea/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file139040.pdf)

Wolf, C. 和 Cheng, S.-K. (2018b) 2000 - 2017 年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中国海外承包工程和经济多元化 [Chinese overseas contracted projects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Angola and Ethiopia 2000-2017]. 非洲工业发展、建筑和就业工作报告 (IDCEA Working Paper) 第 03 期. 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www.soas.ac.uk/idcea/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file139041.pdf)

Woods, N. (2008) '谁提供的援助？谁产生的影响？中国——新兴资助国和发展援助无声革命'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国际事务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6): 1205–1221 (<https://doi.org/10.1111/j.1468-2346.2008.00765.x>)

Xia, Y. (2019a) 中国在肯尼亚的农业和制造业投资：一项范围界定研究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Kenya: a scoping study].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30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d657c6d44756300019e37ad/1566932078004/WP+30+Xia+Chinese+Investment+Kenya.pdf)

Xia, Y. (2019b) 中国在坦桑尼亚的制造业和农业投资：一项范围界定研究 [Chinese manufacturing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Tanzania: a scoping study].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31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d657cc26b13b8000119fe39/1566932162523/WP+31+Xia+Chinese+Investment+Tanzania.pdf)

Xia, Y. (2019c) 垃圾制造财富？中国在坦桑尼亚塑料回收行业的投资和技术转移 [Wealth from waste?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Tanzanian plastic recycling industry]. 中非研究所工作报告 (CARI Working Paper) 第 27 期.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所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cdc2a9215fcc041dccc3b8d/1557932690743/WP-2019-06-XIA-Tanzania-Cluster-Plastics-Study.pdf)

Xu, J., Gelb, S., Li, J. 和 Zhao, Z. (2017) 适应中国轻工制造业成本上升的趋势：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哪些机会？ [Adjusting to rising costs in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wha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支持经济转型报告 (SET Report). 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支持经济转型部 (Suppor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DI) (setodi.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ET_Survey-report_Chinese-manufacturing_Final.pdf)

Zafar, A. (2007) 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宏观经济、贸易、投资和援助关系 [The grow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macroeconomic, trade, investment, and aid links]. 世界银行研究观察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2(1): 103–130 (<https://doi.org/10.1093/wbro/lkm001>)

Zeit, A.O. (2015) 发展援助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以加纳为例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Ghanaian case]. 全球经济治理工作报告 (GEG Working Paper) 第 104 期. 牛津：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全球经济治理计划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Programme,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www.geg.ox.ac.uk/publication/geg-wp-2015104-new-politics-aid-changing-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development)

本报告中列出的观点均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 DFID、ESRC 或 ODI 的观点。

© DEGRP 2020 版权所有

degrp.odi.org



Research jointly supported by the ESRC and DFID

